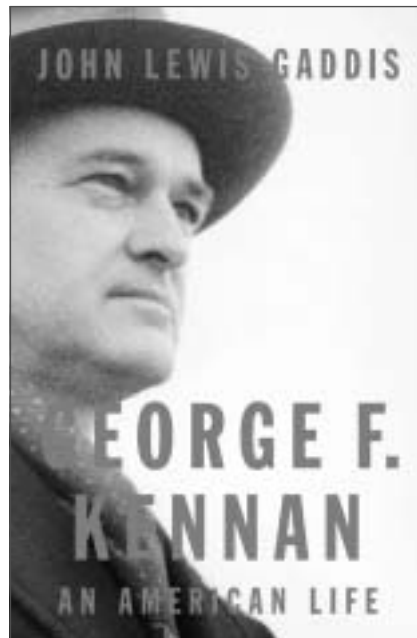


# 「冷戰之父」的傳奇一生

## ——評John L. Gaddis, *George F. Kennan: An American Life*

• 何 慧

《凱南傳》出版後雖好評如潮，卻也爭議不少。有人說該書「透徹」、「犀利」、「生動」、「引人入勝」，也有人說蓋迪斯過於側重凱南的前半生而忽視其後半生、蓋迪斯為「遏制」戰略的辯護帶有個人偏見，等等。



John L. Gaddis, *George F. Kennan: 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11).

2011年，美國著名冷戰史學家蓋迪斯 (John L. Gaddis) 的新書《凱南：一個美國人的一生》(*George F. Kennan: An American Life*)，以下簡

稱《凱南傳》，引用只註頁碼) 一出版即引起廣泛關注，並在2012年榮獲普利策最佳傳記獎 (the Pulitzer Prize for Biography)。該書出版後雖好評如潮，卻也爭議不少。有人說該書「透徹」、「犀利」、「生動」、「引人入勝」，也有人說蓋迪斯過於側重凱南 (George F. Kennan) 的前半生而忽視其後半生、蓋迪斯為「遏制」戰略的辯護帶有個人偏見，等等<sup>①</sup>。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是由於此書是兩位奇才特殊合作的結晶，因而份外矚目；二是在於儘管作者用長達700多頁的篇幅詳盡地記述了凱南101歲的傳奇人生，但仍沒有完全滿足人們了解凱南的需求；三是有關凱南和冷戰的評價不僅具歷史價值而且有現實意義，但人們的理解並不相同。

### 一 凱南與蓋迪斯的絕配

凱南是美國著名的外交家、政治活動家、歷史學家，他是「遏制」戰

略的提出者，有「冷戰之父」的美譽。1904年2月16日，凱南出生於美國威斯康辛州密爾沃基 (Milwaukee) 的一個普通家庭。1925年，凱南從普林斯頓大學畢業後進入外交部門，1929至1931年先後在捷克、德國和波羅的海國家任外交官。在1933年美國與蘇聯建交後，凱南被任命為美國駐蘇聯大使布利特 (William C. Bullitt) 的助手兼翻譯，使他得以有機會把從書本上所學的俄羅斯歷史文化知識與自己親身的觀察相結合，並初步形成了對蘇聯的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時，凱南正在德國而因此受到納粹當局拘禁，數月之後才被遣送回到美國。在其後的戰爭年代，凱南先後在葡萄牙里斯本和英國倫敦的美國大使館工作。

1944至1946年，當全世界開始由大戰轉向和平之時，凱南在美國駐蘇聯大使館任公使銜參贊。在此期間，他對美國在戰後應該對蘇聯採取甚麼樣的外交政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這些看法集中體現在他1946年2月從莫斯科發回美國國務院的著名的「長電報」(the “Long Telegram”) 中。他在對蘇聯的內政外交進行深入分析後提出了美國應採取的長期戰略，其觀點引起美國政府決策者的高度重視。1947年，凱南以署名「X」在美國有影響力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雜誌上發表題為〈蘇聯行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的文章(即著名的「X文章」[“The X-Article”])，明確提出美國對蘇聯的擴張傾向應進行長期、耐心、堅定與警覺的「遏制」(containment)。之後，作為美國對蘇聯外交政策基礎的「遏制」

戰略漸為世人知曉，凱南也因此名聲大噪<sup>②</sup>。

《凱南傳》作者蓋迪斯1941年出生在美國南部德克薩斯州的一個小鎮。1960年代在德克薩斯大學完成了從本科到博士的學業，他畢業之後先是在印第安納大學東南分校任教，從1969年起在俄亥俄大學任教，1997年開始在耶魯大學擔任美國外交史講座教授。

蓋迪斯是美國冷戰史研究「後修正派」(Post-Revisionist School) 和「冷戰史新研究」(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的代表人物。他在1972年出版的《美國與冷戰起源 (1941-1947)》(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一書中，質疑冷戰史「修正派」將冷戰發生的主要原因歸為美國出於自身經濟利益的考量，認為冷戰既是美蘇及國際、國內外各種因素綜合的結果，蘇聯也難辭其咎<sup>③</sup>。該書在1973年獲得美國最有權威的史學大獎——班克羅夫特獎 (Bancroft Prize)，也一舉奠定了蓋迪斯作為美國冷戰史「後修正派」領軍人物的地位，此時的蓋迪斯年僅三十二歲。

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冷戰面臨結束之時，蓋迪斯又站在了冷戰史學的最前沿，發表了大量文章，對傳統觀點提出挑戰，並引領美國外交史及國際冷戰史研究邁上了新的台階。他在1997年出版了《我們現在知道了：對冷戰歷史的再思考》(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一書，在大量參閱包括蘇聯檔案在內的新資料後，他對以自己為代表的美國冷戰史「後修正派」的觀點又進行了重大修正。他在書中從制度、文化、傳統

1947年，凱南以署名「X」在美國的《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文章，明確提出美國對蘇聯的擴張傾向應進行長期、耐心、堅定與警覺的「遏制」。之後，作為美國對蘇聯外交政策基礎的「遏制」戰略漸為世人知曉，凱南也因此名聲大噪。

凱南給予了蓋迪斯充分信任，他們之間已經不僅是傳記作家和傳記主人公的關係，而是「人生中相當重要的夥伴」，所以，《凱南傳》是凱南和蓋迪斯兩人特殊的合作產物，稱二人是「絕配」，實不為過。

等更深的層面探討冷戰的起源，分析物質化的世界背後人的性格、心理等因素，並將冷戰置於二十世紀全球歷史的視域中，從而開啟了「冷戰史新研究」的時代<sup>④</sup>。蓋迪斯在冷戰史及大戰略研究方面的卓著成果，使他獲得了2005年美國國家人文獎(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他也被稱為美國的冷戰史學術泰斗。

1981年，七十八歲的凱南同意與四十歲的蓋迪斯合作，由蓋迪斯撰寫凱南的傳記，那時的凱南已是公認的外交家、大戰略家、歷史學家、自傳作家、文化批評家及反戰活動家。當時他們達成默契：這本傳記會在凱南去世後的幾年內問世，可他們都沒有想到這一天的到來會是那麼久。凱南在2005年3月17日去世，享年101歲，此時蓋迪斯六十四歲，他已經為這本傳記的寫作準備了二十四年。在凱南去世後，蓋迪斯又花了四五年時間寫作，至2011年正式出版《凱南傳》，該書從籌備到推出歷時整整三十年。

凱南授權蓋迪斯「無條件地」接近他，使用他的文獻和大部分的手寫日記，蓋迪斯因此閱讀了凱南約2萬頁日記、300箱文件以及大量檔案。在凱南的鼓勵下，他的很多朋友和大部分家庭成員在蓋迪斯開始這項工作時就與他進行了訪談，蓋迪斯寫道：「好在做了這些事，因為凱南幾乎比他們都要長壽。」(頁x)蓋迪斯採訪過凱南很多次。前期多為正式採訪，後來則是一些非正式的拜訪，在凱南生命的最後二十五年裏，蓋迪斯大概每年拜訪凱南一次。凱南知道他永遠讀不到這本傳

記，卻給予了蓋迪斯充分信任，他們之間已經不僅是傳記作家和傳記主人公的關係，而是「人生中相當重要的夥伴」(頁x-xi)，所以，《凱南傳》是凱南和蓋迪斯兩人特殊的合作產物，美國學者科斯特吉利奧拉(Frank Costigliola)稱二人是「絕配」(perfect match)<sup>⑤</sup>，實不為過。

## 二 「遏制」戰略的形成及評價

凡是對世界現代史、美國當代外交史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遏制」這個概念，大都會把「遏制」與凱南聯繫在一起。凱南與「遏制」戰略確實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1946年，二戰結束不久，儘管人們知道美國和蘇聯在大戰的後期已經出現一些摩擦，但大多數美國決策者和普通美國人都認為蘇聯會願意延續與美國的戰時合作，共同維護戰後和平與世界秩序，不過，美國政府並沒有成熟的對蘇政策。

1946年2月，美國駐蘇聯大使館收到華盛頓的指示，要求他們評估斯大林最近的一次講話是否某種轉變的信號。2月22日，凱南向華盛頓發回一份數千字的長電報，他認為蘇聯不是要改變，而是要回到原來的位置，即基於其傳統和文化的對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加上布爾什維克主義「解放全人類」的抱負，蘇聯必然會瘋狂地擴張勢力範圍，美國對此應該保持警惕。如前所述，1947年，凱南又把他在「長電報」中提出的觀點加以進一步闡釋，並以「X」的署名在《外交事務》雜誌上發表文章。蓋迪斯指出：

在大多美國人仍然視蘇聯為戰時盟友時，只有凱南能讓人們相信，由於植根於俄國歷史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意識形態的種種原因，蘇聯絕不可能是和平時期能正常相處的國家，因為斯大林政權需要外部敵人。只有凱南這麼說才能引起華盛頓關注並立即做出反應。只有凱南預見到了美國及其盟國遲早會使蘇聯不戰而敗。(頁694)

凱南寫出「長電報」和「X文章」看似偶然，其實它們是凱南的「直覺」和長期思考的結果。首先是基於他與俄國的淵源及對俄羅斯文化的了解。在蓋迪斯的描述下，凱南有三個「爹」：第一個是他的親爹柯蘇斯·肯特·凱南(Kossuth K. Kennan)，「那位不苟言笑的蘇格蘭長老會教友，他有着強烈的職責意識和在世紀之交的威斯康辛很少有人具備的國際視野」；第二個是他祖父的堂兄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這位具有冒險精神、年輕時勇闖西伯利亞並不遺餘力地抨擊沙皇專制統治的前輩是凱南心中的英雄；第三個是契訶夫(Anton P. Chekhov)，是凱南最為欣賞和喜愛的俄國文學家，他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對俄羅斯民族性格和所經歷苦難的描述給凱南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頁439-40)。其次是出於凱南早年的經歷，他在里加目睹了蘇俄革命中血腥殘酷的場面，在德國受到納粹拘禁時體會到生離死別，這一切都使他對專制主義極為憎恨。再者，自幼喪母的經歷導致凱南在內心深處一直有很強的不安全感，這也折射到他對蘇聯的認識中。

凱南雖然提出了「遏制」戰略，但其「遏制」概念與美國政府所實行的「遏制」政策有一定的差異。凱南主張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和心理上對蘇聯進行長期的全面遏制，而美國政府從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到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從美日安保條約到巴格達條約，逐步構築起從軍事上圍堵蘇聯的全球網絡；蘇聯則以華沙條約組織、紅色陣營及核武庫與之對抗。凱南對於美國政府的許多做法是不贊成的，並且也在不斷修正自己的觀點，他從最初主張對蘇聯強硬到後來支持與蘇聯對話，他反對美國發動越南戰爭、反對發展核武器，他對美國歷屆政府的外交政策都不乏批評，後來還一直力圖消除「遏制」概念的負面影響，例如1994年的一天，克林頓(William J. Clinton)總統在白宮問副國務卿塔爾博特(Strobe Talbott)他們為甚麼沒有一個像「遏制」這樣簡潔明瞭的概念時，塔爾博特轉而向凱南尋求用一個短語來概括後冷戰時代的美國政策，但凱南勸他不要這麼做，因為「遏制」就是過於簡單化的「保險槓貼紙」並誤導了人們(頁680)。

蓋迪斯對於「遏制」戰略評價很高，認為「遏制」戰略使「國際體系從二十世紀上半期的自我毀滅中走了出來，到二十世紀末，排除了發生大國交戰的危險，復活了民主和資本主義並因此增強了超越從前的自由的前景」，是凱南指出了一條「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綏靖之路」和「導致難以想像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毀滅之路」之間的中間道路，「……很難想像在那個時候，誰

凱南雖然提出了「遏制」戰略，但其「遏制」概念與美國政府所實行的「遏制」政策有一定的差異。蓋迪斯對於「遏制」戰略評價很高，有學者認為，由於蓋迪斯過於讚賞凱南的「遏制」戰略，因而不青睞凱南在其後半生一直主張並推動美蘇通過協商對話來終止冷戰的努力。

能有這樣的權威、這樣的雄辯或這樣的大戰略思維。」(頁694)不過，也有美國學者認為，由於蓋迪斯過於讚賞凱南的「遏制」戰略，因而不青睞凱南在其後半生一直主張並推動美蘇通過協商對話來終止冷戰的努力。「遏制」戰略提出的時候或許是抓住了當時的現實，卻也使得美國走上以軍事化甚至過度軍事化的手段維護國家安全的道路，也導致了歐洲特別是德國的長期分裂<sup>⑥</sup>。

### 三 凱南豐富而複雜的一生

1946年，凱南回到華盛頓，作為新組建的戰爭學院的副院長，他負責設置課程並為那些即將成為美國軍隊和外交骨幹的學員親自講授大戰略。1947年，新上任的國務卿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調凱南回國務院主持政策計劃室，幫助制訂美國的對外政策，凱南也因此對這個時期美國對歐洲、南斯拉夫、中國和日本的外交政策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不久之後，1949年底，凱南因與接替馬歇爾擔任國務卿的艾奇遜(Dean G. Acheson)意見分歧而辭去政策計劃室主任一職，脫離了最高決策圈子。

1952年，凱南被任命為美國駐蘇聯大使，這是凱南等待已久的職務，他也希望能有所作為，可是僅四個多月後，蘇聯便因凱南的出格言論宣布他為「不受歡迎的人」，凱南也因此而離職。凱南回到美國後沒有得到新的任命，只得從國務院退休，之後受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院長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之

邀到核校正式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除了1961至1963年由肯尼迪(John F. Kennedy)總統提名獲任美國駐南斯拉夫大使外，凱南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度過了她的後半生。

凱南前半生事業的頂峰是提出「遏制」戰略，他的後半生似乎沒有前半生那麼輝煌，但其實也很精彩。蓋迪斯的《凱南傳》用500頁篇幅敘述凱南的前半生，而關於他的後半生僅佔200頁，這也引來一些批評，認為蓋迪斯忽略了凱南後半生的一些重要事情，如1966至1967年出席國會聽證會、對越南戰爭的批評、反對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總統競選連任，以及長期擔任美國國會議員並曾在1968年作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著名政治家麥卡錫(Eugene McCarthy)在反對越南戰爭的問題上對凱南的影響，等等。蓋迪斯對此則回應說，他較少著墨於凱南的後半生是考慮到讀者更願意了解早期的凱南及其作為，而不會對凱南年老多病的晚年瑣事感興趣<sup>⑦</sup>。

儘管如此，蓋迪斯還是較為真實而全面地描述了凱南豐富而複雜的一生。凱南生性敏感，個性獨特，與一般的外交官不同。凱南作為外交官的最高職務是擔任美國駐蘇聯大使和駐南斯拉夫大使，從職能上看，他是國務院層面的政策執行者，但他在實際上參與了不少外交政策的決策。然而，由於他不是高層決策者，他的很多主張並未付諸實現。從外交職業生涯來說，凱南不是非常成功，反而有不少失敗，這主要是他的個性所致。凱南是一個性情中人，容易情緒失控，口不擇言，從而釀出苦酒。如前所述，他在1952年擔任美國駐蘇聯大

蓋迪斯較為真實而全面地描述了凱南豐富而複雜的一生。從外交職業生涯來說，凱南不是非常成功，反而有不少失敗，這主要是他的個性所致。凱南是一個性情中人，容易情緒失控，口不擇言，從而釀出苦酒。

使期間，由於受到蘇聯的故意冷落而忍不住在公開場合將蘇聯與納粹德國相提並論而遭致任期中斷，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凱南雖然是美國現實主義外交的代表，但他有理想主義情結，而且不諳政治，這使他不時做出莫名之舉。例如凱南在1954年因一時衝動準備競選議員，卻對競選程序和相關問題欠缺考慮，結果在參選僅四天後突然宣布放棄。

凱南既具有文人氣質又生性孤傲。他閱讀廣泛，喜歡閱讀古典文獻，常常引用莎士比亞、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吉本(Edward Gibbon)等人的經典語句，這使他有點曲高和寡，與華盛頓官場的實幹派格格不入，有人稱他「不是地球上的凡夫俗子」(頁638)。蓋迪斯在《凱南傳》中花了大量篇幅敘述凱南的家庭、個人生活、情感和內心掙扎，甚至他的夢境。蓋迪斯還梳理了凱南與其他重要歷史人物的關係，如馬歇爾、艾奇遜、肯尼迪、奧本海默、戴維斯(John P. Davies)、波倫(Charles E. Bohlen)、尼茲(Paul H. Nitze)等。凱南在政界和外交界的朋友寥寥無幾，在他打過交道的歷任美國總統中，肯尼迪對他最為器重，而他對肯尼迪也頗為欣賞。蓋迪斯在《凱南傳》中直接引用了大量凱南日記，呈現給讀者一個鮮活的凱南，不過，日記也有局限，如凱南的夫人安妮麗絲(Annelise Sorensen Kennan)曾提醒蓋迪斯說，凱南的著述中「充滿陰鬱氣質和黯淡色彩」，但他「並不總是這樣的」(頁x)。的確，凱南熱愛航海、喜歡寫詩、會彈吉他、樂幹農活，有充滿活力的一面。

《凱南傳》一書的副標題是「一個美國人的一生」，有讀者質疑凱南並不能代表美國人的生活，他與普通美國人的現實生活有很大差異。作為外交官，凱南前半生長期生活在國外，以至於他對西歐各國以及俄羅斯的了解甚至超過對美國的了解。凱南確實因為職業之故對美國有一定的疏離感，但他後半生基本上是在美國度過的，他即使大部分時間埋頭於故紙堆，也並非生活在真空狀態中，事實上，凱南對美國社會的一些醜惡現象的批評，反映出的恰恰是他對祖國深切的愛。凱南的後半生可以說不只是一個學者，而且是一個公共知識份子，他對環境問題尤為關注。

#### 四 凱南對中國的看法

《凱南傳》涵蓋了凱南的工作與生活、思想與行為的方方面面，中文讀者或許希望也能從中知曉中國在凱南的大戰略中處於甚麼位置、凱南對中國的看法如何。這些內容在書中有所呈現，但比較零散，不成系統。

凱南早年對遠東事務興趣不大，但他在與熟悉中國事務的戴維斯接觸之後，從後者那裏接受了不少關於中國的觀點。戴維斯是美國傳教士的兒子，出生在四川，曾就讀燕京大學，後來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專攻中國事務，二十世紀30年代起在美國駐華使館工作。他對中國十分了解，是有名的中國通。二戰期間，戴維斯曾是中緬戰區司令史迪威(Joseph W. Stilwell)的幕僚，他很早就意識到國民黨政府腐敗，缺乏民眾支持，國民黨與共產黨終有一

《凱南傳》涵蓋了凱南的工作與生活、思想與行為的方方面面。中國在凱南的大戰略中處於甚麼位置、凱南對中國的看法如何？這些內容在書中有所呈現，但比較零散，不成系統。

1970年代初，尼克松總統開啟新的對華關係沒有引起凱南的注意。凱南擔心重演美國在1933年承認蘇聯後的「過高期望」，甚至警告說不要與這個「非西方大國」結成夥伴，也不相信中國這個種族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異數」會對美國全面開放。

戰，他曾警告美國不要太偏向蔣介石，他支持民族主義，主張與中共對話。他去過延安，主張美國與中共在軍事上合作抗日，以減少中共對蘇聯的依賴，但他因對國民政府不滿而被調離中國並派去蘇聯，成為凱南的同事。凱南在擔任政策計劃室主任時又把戴維斯調來一起工作，為馬歇爾調停國共內戰失敗後的美國對華政策獻計獻策<sup>⑧</sup>。凱南一直認為「共產黨的勝利是因為蔣介石政權的虛弱和腐敗，應該由蔣政權自己負責」，還說中國形勢惡化「對美國的利益來說並非致命打擊」，美國不應深陷中國事務<sup>⑨</sup>。

1949年，新中國宣布成立後，對於要不要承認中國的新政權，美國政府內部出現分歧。凱南儘管懷疑中共能否在全國範圍內長久地維持政權，但他此時主張承認中國並與之建立正式關係，因為這樣可以阻止中國「斯大林化」。他認為不能僅從意識形態考慮而不承認共產黨國家，否則無法解釋美國為甚麼和南斯拉夫、蘇聯和東歐國家建立了正式關係。不過，他的建議沒有引起最高決策者的重視。朝鮮戰爭爆發後，凱南也提出過各種建議和預測，但他並不是從戰略角度來看中國的。在凱南的全球戰略評價中，歐洲優先於亞洲；在亞洲則是日本優先於中國，他認為日本是世界上五個需要加強軍事力量的地區之一，而中國不是一個強大的工業國，也「看不出中國在未來較長時間裏會成為工業強國」或軍事強國<sup>⑩</sup>。

凱南對發展美中關係缺乏熱情。他雖然欣賞中國人的勤奮、誠實、精明，但認為中國作為一個民族是「強烈排外和驕傲自大的」；儘

管中國有高度文明，但「當他們認為自己受到了冒犯的時候，也能極其殘忍冷酷」，因為他們「缺乏西方基督徒所具有的兩種精神活動：同情心和罪惡感」，而且凱南「從不覺得美國外交官在北京會受到尊重」<sup>⑪</sup>。1970年代初，尼克松(Richard M. Nixon)總統開啟新的對華關係也沒有引起凱南的注意，他對此項「外交壯舉」的態度是「冷漠的」，擔心重演美國在1933年承認蘇聯後的「過高期望」，稱中國「不是美國在世界事務上的合適盟友或適合打交道的國家」，擔心尼克松與中國領導人的會談造成許多美國人形成「對兩國間親密關係的虛幻夢境」，甚至警告說不要與這個「非西方大國」結成夥伴，也不相信中國這個種族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異數」(alien)會對美國全面開放<sup>⑫</sup>。

蓋迪斯在《凱南傳》中收錄了凱南1964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上發表的文章中關於中國的那段著名的評論：

中國是偉大的國家，構成亞洲的心臟，多年來，我們把這個國家當做朋友，超過了對其他所有國家，我們部分是為了保衛其利益而打了太平洋戰爭，而它卻落入了一幫令人苦惱的狂熱者手中：他們執著於過時的、似是而非的意識形態，而這種意識形態卻對整個亞洲的人民群眾有極大的吸引力；他們在這一意識形態中發現了一種最殘忍的對其他人施以權力的辦法；他們把這種意識形態偏見與傳統的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最暴力的潮流結合起來；把他們的權力與這個國家傳統上的統治集團的傲慢和自負聯繫起來，

這個集團長久以來一直把自己視為世界的中心；他們的心中充滿了野心，想要把他們現在正對中國人民運用的獨裁權威進一步擴展到亞洲的其他地區；出於這個原因，他們提出了早前的中國政府全部的領土要求，這些要求沒有哪怕一點點可信的歷史證據；如今，他們那裏完全瀰漫着對我們的仇恨，不僅僅是因為他們的意識形態把我們都刻畫為惡棍，而且因為我們比其他任何國家的人民更為強大並不顧一切地去阻擋他們的路，妨礙他們擴張權力。（頁582-83）

這段話即使在當時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聽起來也覺得是一種「刺耳的」表達方式<sup>③</sup>，而蓋迪斯並沒有對此做出評論。有論者指出，凱南的確是一個「持歐洲中心觀的現實主義者」，他長久以來一直用「東方的」（“oriental”）這樣一個貶義詞來指稱中國人<sup>④</sup>，可見其明顯的種族偏見。這並不奇怪，因為美國政府中不少領導人及社會精英都有這樣的思想，如被稱為「大西洋主義者」（Atlanticist）的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說過，要是「認為東方人的思考在邏輯上和我們一樣，我們就錯了」；美國前國務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則認為蘇聯人至少還是「一個能理解的歐洲對手」，而在中國人的行為裏「情緒起了大部分的作用」<sup>⑤</sup>。

## 五 多才多藝的學者

蓋迪斯的著作一貫資料詳實、理論高深、觀點新奇，《凱南傳》與

他的其他歷史著作一樣厚重，但可讀性很強。該書有三大特色：其一，趣味性。《凱南傳》生動地描繪了凱南不平凡的一生，凱南出生不久後母親病故，從此，死亡的主題在他的生活和思想中就一直縈迴不散，但是凱南也有樂觀的時候，他也是懂幽默、愛生活的人，例如他有一次在給女兒寫信的時候就以家中小狗的語言來敘述自己的生活（頁542-43），讀來饒有趣味。

其二，中立性。蓋迪斯在書中用大量篇幅解讀甚至「解構」了凱南的大戰略思想，但對於其觀點和行為並不判定對錯。蓋迪斯總體上說是非常讚賞凱南的，但也不避諱他的性格弱點，如自我中心的傾向、反覆無常的特質，還記述了凱南對兩位批評他的年輕人的「報復」、莫名其妙地討要「自殺藥片」的事情（頁448），基本保持了不隱不揚、盡可能客觀的立場。

其三，嚴肅性。《凱南傳》不煽情，不媚俗，對凱南的婚外情點到為止。凱南從出生後就在女性環繞的環境下長大，一生中也有幾個知心的女性朋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與輾轉流亡到美國的斯大林的女兒阿里盧耶娃（Svetlana I. Alliluyeva）的友情。蓋迪斯對凱南夫人給予了極大的尊重和肯定，這位與凱南共同生活了七十四年的挪威婦女全心全意地照顧凱南，任勞任怨地操持家務，更重要的是她在凱南的生活中起了「穩定性作用」（頁x）。

儘管蓋迪斯在書中保持了基本客觀的立場，但他給予了凱南極高評價，說他是戰略家、歷史學家、作家、哲學家、教師。蓋迪斯指

蓋迪斯在書中用大量篇幅解讀甚至「解構」了凱南的大戰略思想，但對於其觀點和行為並不判定對錯。蓋迪斯總體上說是非常讚賞凱南的，但也不避諱他的性格弱點，基本保持了盡可能客觀的立場。



蓋迪斯對凱南的評價歸結到一個詞：「偉大」。或許不是人人都能接受這個評價，但只要耐心地讀完《凱南傳》，一定會對凱南豐富而且複雜的一生印象深刻，因為他的一生折射出人性的多面色彩，映照出社會的光怪陸離。

出，作為戰略家，凱南的「遏制」理論匯聚了各種思想，包括吉本對羅馬帝國的研究、俄國作家筆下的俄國社會與文化、他對蘇聯領導人個性的判斷及對美國的信心。凱南相信，如果美國能堅持它的立國原則，就能比蘇聯更名為世界提供有吸引力的樣板，蘇聯自身也會受到感染，而這一切需要長期、耐心、堅定的遏制。蓋迪斯認為凱南的大戰略堪比孫子、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等前人的貢獻。

作為歷史學家，凱南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的時候就了解了歐洲和美國的歷史。在其早期的外交官生涯中，凱南特別醉心於俄國的歷史和文化。相對來說，他對大戰略的研究和思考出現在其外交官生涯後期——他1946至1947年在戰爭學院的時候為設置課程而應急地讀了大量關於大戰略的經典著作。凱南撰寫過關於法俄關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歷史著作，他因歷史類著作和自傳得過兩次國家圖書獎、兩次普利策獎和一次班克羅夫特獎，這是許多歷史學大家也望塵莫及的。

作為作家，凱南確有語言天賦，他精通俄語、德語，才華橫溢，文筆優美，有高超的寫作技巧。他著述甚豐，大約有二十本著作，還有許多文章，特別是「他所有的散文幾乎都情感充沛，言辭犀利，富於創造性，閃耀着智慧之光」(頁696)。

作為哲學家，他無時無刻不在「為承擔對文明、國家、社區、家庭和自己的責任而苦惱」(頁696、697)。同時，他本人也是一部生活

教科書，他八十幾歲還騎自行車在普林斯頓轉悠，還推車上坡，還能敏捷地駕駛他在挪威的小游艇，他年過九旬仍筆耕不輟。

作為教師，凱南曾在美國海軍學院、牛津大學、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授課，但更多的時候是在別の場合，以多種方式給予人們教誨。他的廣播講座、書籍文章、國會聽證，無論是領導人還是公眾都從中受益匪淺。

凱南不是一個位高權重的人，也沒有多麼顯赫的政績，他的職業生涯充滿波折，他在很多時候陷入苦悶。蓋迪斯對凱南的評價歸結到一個詞：「偉大」。或許不是人人都能接受這個評價，但是，只要耐心地讀完這本厚厚的《凱南傳》，一定會對凱南豐富而且複雜的一生印象深刻，從感慨、感動直到感悟，因為他的一生折射出人性的多面色彩，映照出社會的光怪陸離。

《凱南傳》也肯定不是關於凱南的最後一本書，因為收藏在普林斯頓大學馬德手稿圖書館(Seeley G. Mudd Manuscript Library)多達三百多箱的凱南資料現在已經向研究者開放了，將來一定還會有人利用這些資源推出新的成果。

《凱南傳》還能促使你想到很多問題，如最現代化、最發達的美國是不是世界的楷模？凱南自認為更喜歡生活在十八世紀，是他落伍還是現代的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潮流值得檢討？「冷戰思維」是歷史的產物還是美國的特權？我們或許並不能從《凱南傳》中得到現成的答案，但《凱南傳》一定會激發我們的思考，這已經足夠了。

### 註釋

① 參見*H-Diplo Roundtable Reviews* XIII, no. 24 (2012), [www.h-net.org/~diplo/roundtables/PDF/Roundtable-XIII-24.pdf](http://www.h-net.org/~diplo/roundtables/PDF/Roundtable-XIII-24.pdf)。

② 有關凱南的研究和著作從1980年代以來就一直沒有中斷，其中較有影響的著作包括David Mayers, *George Kennan and the Dilemmas of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Walter L. Hixson, *George F. Kennan: Cold War Iconocl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Wilson D. Miscamble, *George F. Kennan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7-195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John Lukacs, *George Kennan: A Study of Charact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③ John L.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④ John L.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關於「冷戰史新研究」及蓋迪斯的地位，參見陳兼、余偉民：〈「冷戰史新研究」：緣起、學術特徵及其批判〉，《歷史研究》，2003年第3期，頁3-22；何慧：〈冷戰大歷史觀簡析——以《冷戰：一部新歷史》和《人心之爭》為中心〉，《冷戰國際史研究》，2011年第1期，頁39-57。

⑤⑥⑦ 參見*H-Diplo Roundtable Reviews* XIII, no. 24, 6; 7-8, 25; 8-9, 47。

⑧ 戴維斯的在華經歷，參見戴維斯(John P. Davies)著，羅清、趙仲強譯：《抓住龍尾——戴維斯在華回憶錄》(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⑨ Wilson D. Miscamble, *George F. Kennan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7-*

*1950*, 212-17; George F.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 373; George F. Kennan, *At a Century's Ending: Reflections, 1982-1995*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6), 98。相關研究參見張小明：〈喬治·凱南與美國冷戰時期的東亞政策〉，《國際政治研究》，2008年第3期，頁132-53。

⑩ Wilson D. Miscamble, *George F. Kennan and the 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47-1950*, 217, 220-22; George F.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374-75。

⑪ George F. Kennan, *Memoirs, 1950-1963*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2), 55-58。

⑫ Anders Stephanson, *Kennan and the Art of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64; Walter L. Hixson, *George F. Kennan: Cold War Iconoclast*, 265。

⑬ James Peck, "The Roots of Rhetoric: 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America's China Watchers",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2, no. 1 (1969): 59。

⑭ Walter L. Hixson, *George F. Kennan: Cold War Iconoclast*, 108。

⑮ Nancy B. Tucker, *The China Threat: Memories, Myths, and Realities in the 1950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181; Gordon H. Chang [張少書] 著，梅寅譯：《敵乎？友乎？——美國分化中蘇聯盟內幕：中美蘇關係探微(1948-1972)》(台北：金禾出版社，1992)，頁166、168。

何 慧 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美國研究中心主任。